

# 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冲突与冷战起因

康 春 林

以苏联和美国为双方代表的东西方冷战，是战后20多年国际政治关系的一个主要特征。笔者认为，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剧烈冲突是冷战的主要起因，这场冲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场世界性冲突。让我们沿着历史发展的步伐来分析和说明这个问题。

东西方的冷战正式始于1947年，但它并非突然发生于这一年。就这场冲突所反映的本质矛盾看，它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发端可以说是1942年冬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所标志的大战的转折。反法西斯同盟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意味着世界人民与法西斯的斗争这一世界的主要矛盾即将解决，它将让位于被大战暂时掩盖的传统的主要矛盾，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

英国首相丘吉尔，凭着他敏锐的阶级意识和战略眼光，立即预见到这一转变。1942年12月3日，即斯大林格勒传出苏军大举反攻的消息不久，丘吉尔就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最近发生的极为重要的事件，已经改变了并且正在改变着迄今为止一直为大西洋两岸的人们思路根据的论据”。<sup>①</sup>丘吉尔明显认为，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的谁胜谁负的战斗，这个一直作为英美两国思考问题的根据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新的思路的根据是即将上升为世界范围的主要矛盾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丘吉尔当时的思想和大量言论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思想和言论见诸他自己和英美军政要人的回忆录等著作。他认为，英美必须对“随着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大军长驱直入而到来”的“共产主义影响的高涨”保持高度的警惕。<sup>②</sup>西方军队的战线“应该尽可能深入到东方”，因为“在击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后，文明所必然面临的危险将是共产主义”。<sup>③</sup>在丘吉尔的回忆录中，类似的言论很多。他不时地向欧美敲击“共产主义威胁”的警钟。

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实际“威胁”将表现在哪里呢？丘吉尔的上述言论已经作出回答，那就是西方军队“应该尽可能深入到”的“东方”。这个“东方”不可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苏联，而是尽可能接近苏联的地方。这就是东欧地区。

① 丘吉尔，《第二次大战回忆录》第4卷下部，第3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70页。

② 丘吉尔，《第二次大战回忆录》第6卷上部，第2分册，第328页。

③ 丘吉尔，《第二次大战回忆录》第6卷下部第3分册，第671页；上部第2分册，第450页。

丘吉尔的言论实际上也指出了如何对待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即用西方军队占领东欧。这是战争期间,当机枪和大炮作为最有力的政治武器时,最现实的解决办法。在这一点上,丘吉尔与讲究实际的政治家斯大林不谋而合。1944年,斯大林在接见南共军事使团时说:“谁占领哪里谁就会在那里推行他的社会制度,不会是别的样子”。<sup>④</sup>

因此可以说,二战中期,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变成了潜在的主要矛盾时,它就在谁占领东欧及东欧的政治取向上表现了出来。

正是基于上述长远的政治战略,丘吉尔在当时盟国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即第二战场问题上的态度立即明朗化。他更加努力地鼓吹第二战场的“巴尔干方案”,坚持把第二战场的地点选在巴尔干,试图用巴尔干战场代替西欧登陆。巴尔干方案的主要内容,就是英美联军从希腊或达尔马提亚登陆,东从希腊一线向北,西从卢布尔雅那隘口向多瑙河平原进攻,要在苏军进入东欧以前尽量多的占领东欧地盘。用一句话表达,可以说巴尔干方案意在用西方军队占领东欧。丘吉尔等利用1943年1月英美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到11月的开罗会议等历次高级军事会议,不遗余力地兜售巴尔干方案,反复阐述这一方案军事上的优点和政治上的意义,力促美国同意它。很明显,这时的巴尔干方案已经从最初提出时的军事方案变成了一个政治军事方案。

丘吉尔鼓吹巴尔干方案的政治用心,还可以用他不愿将这一方案公开告诉斯大林这一点来说明。因为他觉得方案与苏联对立的色彩太明显,必将遭到斯大林的坚决反对。这一点为后来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的态度所证实。

虽然巴尔干方案是个未被实施的方案,但是这一方案的目的及东西方大国对这一方案的态度,已完全暴露出未来东西方矛盾和冲突的主要所在和主要内容。它已预示了冷战的到来。

美国总统罗斯福最终决定拒绝巴尔干方案,确定西欧为第二战场。罗斯福之所以暂时没有像丘吉尔那样咄咄逼人地与苏联争夺东欧,原因主要有二:1.他认为东欧是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担心越俎代庖,引起英国不满,因为东欧问题“显然是英国人的任务,因为他们在那里有更多的切身利益”。<sup>⑤</sup>2.他认为,不管英美是否赞成,苏军进入东欧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将把比英美“混合兵力大一倍的军队投入战场”,如果与苏联闹僵,英美在东欧“就根本没有发言权了”。<sup>⑥</sup>从美国的全球战略看,美国还需要苏联在对日作战等问题上的合作。当然美国政府并非没有看到东欧将成为东西方争夺的焦点。罗斯福在决定拒绝巴尔干方案时,曾怀疑这样作是否是“抱着冒险精神去决定军事策略”,因为他担心苏联会“接管”东欧。罗斯福怀着苏美争夺东欧的潜在意识,决定暂时不在苏联敏感的东欧问题上与对方闹僵,先让英国充当发言人,而期望战后依靠其实力和“拥有的影响来改善”东欧局势。<sup>⑦</sup>

西方不能形成统一意志,通过军事手段与苏联争夺东欧,便越来越把主要努力放在政治解决的方式上,主要有:1.1943—1944年,英美与罗、匈、保政府进行了单独媾和的谈判,企图撇开苏联,单方面政治解决德国的东欧附庸国的问题,建立英美所希望的政府;2.撮合各种东欧和中欧联邦,以图建立处于英美影响之下的政府。英国纵容土耳其出面撮合保、罗、匈成立巴尔干同盟,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英美政府和波、捷流亡政府就英美

<sup>④</sup> 转引自马丁·麦考利,《冷战的起因》(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伦敦—纽约1983年版,第100页。

<sup>⑤</sup> 阿·罗辛,《战后欧洲的调整》(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в Европе),莫斯科1984年版,第72页。

<sup>⑥⑦</sup>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25—626、722页。

军队进驻波、捷和建立波捷联邦的问题进行了会谈。此外，英美还阴谋建立由奥、匈、南和德国南部组成的多瑙河联邦；<sup>3</sup>通过各种国际会议、会谈和接触同苏联周旋，以图通过政治谈判的方法恢复或建立东欧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在1943年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英美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战后东欧特别是波兰的问题。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苏联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波兰、南斯拉夫和希腊等问题的解决。访问的结果是达成了臭名昭著的百分比协定。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随着苏军的反攻和逼近东欧，苏联政府除了完成粉碎法西斯德国这一历史重任外，也把政治战略的重心移向东欧。它与英美战略的冲突规定了后来冷战的格局。

斯大林一改战争前期国家危亡之时支持巴尔干方案的态度，而坚决反对它，坚持第二战场在西欧开辟。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直率地指出，西方军队已用不着进入东欧，明显地暴露出苏联包办东欧事务的意向。

斯大林在解决东欧军事占领问题的同时，在苏波、苏罗边界问题、波兰东西边界问题等有关东欧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重大问题上，推行苏联政府的意志。主要因为这个原因，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急剧冷淡，并在1943年4月与其断交，表露出排斥亲西方的政治势力的意向。

苏军进入东欧后，苏联与东欧各国资产阶级以及英美政府的矛盾尖锐起来。1944年7月下旬，苏军越过寇松线，遂将控制波兰的问题提到首位。虽然8月初斯大林同米科拉伊奇克举行了会谈，增加了解决波苏分歧的希望，但华沙起义时斯大林的消极态度再次引起西方的忧虑。哈里曼当时说，苏联的行动是出自“无情的政治考虑”。他在9月10日致霍普金斯的电报中称苏联为“世界恶霸”，并说“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在过去两个月中已经发生了惊人的明显变化”。<sup>⑧</sup>

与冷遇、排斥东欧各国资产阶级的态度相反，苏联坚决支持各国共产党和民主势力的发展，使这些国家先后建立起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使东欧的政治气候逐步明朗化。

苏联对待东欧各国的方针使它与英美的冲突加剧。罗斯福去世前对斯大林的东欧政策非常不满，认为他“已经破坏了自己曾在雅尔塔作出的每一项诺言”。<sup>⑨</sup>而丘吉尔则认为苏联的东欧政策已经印证了他以前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警告，“德国的军事力量的毁灭已经给共产党俄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带来了一个根本的变化”。<sup>⑩</sup>东西方的矛盾发展到这样尖锐的程度，丘吉尔甚至准备与苏联兵戎相见，他向蒙哥马利发出秘密命令，让他作好重新武装和利用德国投降士兵的准备，“假如苏联继续推进的话”。<sup>⑪</sup>

从苏军大量驻扎东欧和东欧各国先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时候起，苏联与英美的冲突公开化、表面化。资本主义的西方和社会主义的东方表现于东欧等问题上的矛盾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由于矛盾带有不可调和的性质，最后发展成为冷战。

我们看到，从1945到1947年，几乎任何重大的国际会议和欧洲会议，都主要围绕着东欧

⑧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650—662页。

⑨ 威·哈里曼，《哈里曼回忆录》，上海1975年版，第40页。

⑩ 丘吉尔，《第二次大战回忆录》第6卷下部，第3分册，第670—671页。

⑪ 弗·沃尔利夫、弗·西波尔斯主编：《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1944—1949》（СССР и страны народ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莫斯科1985年版，第53页。

问题而争论不休。东欧问题是雅尔塔会议争论的中心。在雅尔塔8次全体会议中至少有7次讨论到波兰问题，占据时间最多，争论也最激烈，关键是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即由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领导政府的问题。美国政府已经走到斗争的前台，它为了避免“美国在这一部分地区的势力被彻底清除”，<sup>⑫</sup>要求苏、美、英对东欧共同负责。罗斯福会后致电斯大林，要求克服“华沙政权的明显伪装局面”，并以东西方对抗的“更激烈的形式”的危机来要挟斯大林。<sup>⑬</sup>

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英首脑就罗、保、匈民主政权有没有代表性的问题同苏联首脑激烈争吵。他们把目标集中在处于共产党人“统治之下”的南斯拉夫和“共产党人占优势”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sup>⑭</sup>并粗暴地要求监督东欧各国的选举，改组它们的政府。丘吉尔甚至诬蔑“铁托凭借警察管制和几乎同法西斯国家相似的新闻管制”。<sup>⑮</sup>莫洛托夫以强烈谴责英国对希腊的干涉回敬英美。当丘吉尔提出英美在东欧各国的代表“被围上铁幕”时，斯大林斥之曰“都是神话”。受到会议的影响，罗马尼亚形成了国王米哈伊同民主的格罗查政府对抗的局面。正如查尔斯·波伦所说，“在波茨坦会议上，没有什么题目比关于巴尔干各国的民主性质和关于欧洲解放宣言执行的情况更加暴露出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鸿沟了。”<sup>⑯</sup>杜鲁门刚刚就任总统，就近于粗鲁地向莫洛托夫表示美国对苏联的不满集中在东欧问题上。他在波茨坦会议后得出结论说：“我们和俄国人在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经验使我决定决不在和俄国人设立的联合机构中冒风险……武力是俄国人所理解的唯一的东西。”<sup>⑰</sup>他在第二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明确宣告东欧国家“不应是任何大国的势力范围”，<sup>⑱</sup>显示了美国与苏联争夺东欧的决心。

1945年9月关于战后和约的伦敦外长会议，同样在有关东欧的政府和社会制度的性质等问题上发生激烈争吵，这一会议标志着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时代即协商谈判时代的结束。

协商时代结束后，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步入了冷战政策的决策阶段，苏联对美国的态度则作出了强硬反应。以美国和苏联为冷战两极的局面臻于形成。东欧的上空乌云滚滚。

1946年1月5日，杜鲁门表示要用“铁拳和强硬的抗议”来对付苏联。<sup>⑲</sup>2月，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设计师凯南提出了对苏进行“遏制”的理论，认为美国必须改变它“在东欧没有足够力量”的状况以结束这一地区的“苏联影响”。<sup>⑳</sup>同一月，斯大林发表讲话指出，资本

⑫ 谭圣安，《从雅尔塔看罗斯福》，《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6期。

⑬ 马丁·麦考利，《冷战的起因》，第105页。

⑭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治1978年版，第36页。

⑮ 基比安斯基，《克里木与波茨坦会议上的东南欧问题》，载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和巴尔干研究所编，《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莫斯科1976年版，第173页。

⑯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90页。

⑰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9页。

⑱ 安德鲁·乔治，《欧洲多瑙河国家的政府》(Governments of Danubian Europe)，纽约1945年版，第39页。

⑲ 列明主编，《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168页。

⑳ 梅利尼科夫，《实力与虚弱，华盛顿的对外政策》，(Сила и Весилие,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ашингтона 1945—1982)，莫斯科1983年版，第34页。

主义仍然存在,战争危险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苏联必须着重发展重工业。斯大林讲话不到一个月,丘吉尔就发表了著名的富尔顿演说,表示不能容忍“莫斯科控制的”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铁幕”。<sup>①</sup>斯大林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说这是“对苏联进行战争的号召”。他表示,任何迫使苏联离开东欧的尝试,都将得到十月革命后外国武装干涉得到的同样的结果。<sup>②</sup>请看,因为东欧问题,美苏两国已经剑拔弩张了。

1947年3月宣布的杜鲁门主义,就是宣布美国利用英国力不从心而撤出希腊的机会,带着大量美援,逼近东欧和苏联,从而大规模干涉巴尔干和东欧,向苏联和已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东欧各国发动“一场反对极权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圣战”。<sup>③</sup>而马歇尔计划则是实施杜鲁门主义的战略经济手段。它的目的就是复兴西欧和中欧的资本主义,组成一个敌视东欧民主国家和苏联的集团,从经济上夺取或压垮东欧国家。而主要由东欧国家共产党参加的、由苏共领导的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就是东方对美国的应战,因为“继续孤立的状态会导致相互理解的削弱,有时甚至导致严重错误”。<sup>④</sup>东西方冷战局面正式形成。

以上所述可以说明,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冲突是冷战的主要起因。那么,为什么东欧问题会成为东西方矛盾的焦点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而这三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

## 二

东欧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理状况使它具备成为东西方矛盾焦点的客观条件。1.它靠近苏联的欧洲部分即苏联的中心地区,它夹在苏联和中欧、西欧的大国之间,历来是俄国与欧洲其他大国争夺的对象和交战的场所;2.十月革命后东欧是西方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和封锁的前线国家,即所谓的“防疫带”;3.是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所必须经过和实际经过的地区。

由于这种地理上的特点,沙俄先后与瑞典、波兰和立陶宛、普鲁士、奥斯曼帝国、德国、法国、奥匈帝国冲突和争夺的重点都在东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东欧是东线的主战场。东欧是帝国主义封锁苏俄的主要链条。二战的主战场也在东欧。从历史的角度看来,只要欧洲大陆的东西两端存在着进行争夺的大国,东欧地区缺乏确实的和平环境和本身足够的发展,就难于避免被争夺的命运。东欧地理位置的可悲之处就在这里。

由于东欧地理上的特点,苏军出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进入东欧便成为必然的现象,因为苏军无法跳过东欧进攻德国。其中,波兰是历史上欧洲大国和俄国互相攻伐的习惯通道,也是苏军进攻德国最近的道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与苏联相邻,战时是德国的仆从国,战争后期是德军退守的重要阵地。这样便使苏军的进入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苏

① 阿尔文·鲁宾斯坦,《二战以来苏联对外政策》(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波士顿—多伦多1985年版,第50页。

② 鲁德哈特,《二十世纪的欧洲》(Twentieth Century Europe),新泽西1986年版,第200页。

③ 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上海1974年版,第48—49页。

④ 日丹诺夫1947年9月在情报局战主会议上的讲话。见约瑟夫·纳吉,《二战以来苏联对外政策》(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纽约1984年第2版,第86页。

军进入东欧是师出有名的正义行动，即使它进入东欧时夹带着大国主义的动机。

战争后期，东欧成为苏军重兵屯扎的地区，从欧洲政治地理上讲，形成了东欧的偏重。1945年初，苏联在苏德战场的军队达670万人，占苏军总数的72%，部署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四千多公里的战线。苏联当时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还不足以在世界范围内与美英争雄，但在东欧却具有绝对的局部优势。艾奇逊说：“从地理上说，（苏联的）攻势集中在俄国在东欧的边界一带以及中东地区，因为在那里，苏联的实力地位最强，而美国的实力地位最弱”。<sup>⑤</sup>

然而，西方一直把苏联的西部边界看作一条政治地理界线，在这条界线东边的苏联被看作共产主义的洪水猛兽。苏军进入东欧即解放了法西斯的占领国和仆从国，又侵犯了西方传统的领域。西方不愿意承认和适应这样的现实并总是力图改变它。这就是为什么东欧而不是别的地方成为冷战焦点的原因。

地理上的原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说明为什么恰恰是东欧而不是别处成为冷战的焦点。但我们不是地缘政治论者。地理因素是个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地理条件只为冲突提供了表现的空间这一客观条件。假如东西方大国没有根本利害冲突，那末即使最适宜冲突表现的空间也不会成为冲突的地方。很明显，除了地理上的原因，东欧成为东西方大国冲突的焦点，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安全带”和“防疫带”的战略思想冲突。

东西方大国领导人“安全带”思想和“防疫带”思想的对立和冲突与东欧特殊的地理位置相结合，使东欧作为冷战的焦点成为必然趋势。

“防疫带”因十月革命后西方在东欧建立反苏的锁链而得名。二战期间，因东西方的同盟关系，西方政府没有公开提出重建防疫带，但这样的思想明显存在。巴尔干方案，英美军队先苏军进入东欧的计划，东欧各种联邦的设想，名义上是防止德国东山西起，实则要在东欧建立反苏锁链政权。艾登在1943年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说，欧洲小国家对苏联在东欧的意图有“怀疑”，它表露于“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小国家的代表会议上”，因此他提议成立一些欧洲小国家的联邦。这种设想立即引起了苏联的警觉，苏联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联邦方案使苏联人民联想起防疫带的政策”。<sup>⑥</sup>苏联以此表明它将坚决反对任何防疫带的思想和政策。

美国从主张削弱德国到主张扶持德国，从主张分割德国到主张统一德国的转变、在东欧各国政权问题上的强硬态度、“遏制”理论、在东欧南端的希腊和土耳其修补防疫带的举动和马歇尔计划向东欧渗透的意图等，无不显现出防疫带的幽灵。1946年6月，美国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杜勒斯发表了《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看法和应有的做法》一文，提出应该像20年代那样在苏联周围建立防疫地带，包括波、捷、希、伊、土和南朝鲜等。这是防疫带思想最明确的表露。

斯大林自德黑兰会议前后曾多次谈到本国西部边界未来的安全问题，逐渐形成了把东欧作为本国安全带的思想。请看斯大林1946年3月13日就丘吉尔富尔顿演说的答记者问：“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是因为这些国家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

<sup>⑤</sup>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1978年版，第50页。

<sup>⑥</sup> 罗辛，《战后欧洲的调整》，第23页。

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苏联抱善意态度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呢”?<sup>②</sup>

看来,斯大林的安全带思想首先是预防德国法西斯的复活和再度东侵,虽然在本国领土之外建立安全带的思想绝非什么正确的思想,也是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符合的,但当时斯大林确实是这样想的。就连西方的历史学家在分析安全带的思想时也脱不出斯大林考虑问题的框框。托因比指出,苏联防止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不是同西方订立什么不可靠的同盟,而是“在德国东侧也即苏联自己一边取得一条宽阔的缓冲地带”。<sup>③</sup>随着形势的发展,当美国向遏制和冷战政策过渡时,安全带的思想则变成了主要针对西方的战略考虑,即把安全带作为粉碎和取代防疫带的战略措施。因为斯大林和西方首脑都懂得,防疫带和安全带两种战略是针锋相对,互相排斥的,非此即彼,不可能调和。1944年12月,罗斯福曾向史汀生谈及斯大林战后安全的考虑:“英国过去曾希望在它的周围建立一条由友好国家组成的封锁线,而现在斯大林则把这个想法当作苏联的借口,想占有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其他苏联能够控制的周围邻国”。<sup>④</sup>苏联不但注意美、英军政要人的态度,甚至对社会舆论和学术界的看法也很关注。李普曼在1944年发表的《美国的战争目的》一书中,提到建立包括美、加、欧洲国家直至捷克的“大西洋联盟”的设想,被苏联称为“防疫带的改良方案”。<sup>⑤</sup>

为了挫败西方的防疫带战略,斯大林利用苏军进入东欧后在东欧的绝对优势地位,不顾英美的顽强阻挠,坚决贯彻安全带的政策。斯大林坚持苏联在1939年苏德条约后用军事手段所取得的西部领土,把它作为建立安全带的一部分,并从本国安全的需要出发,从两方面考虑其东欧政策:一)政策不能过激,以免英美苏联盟破裂从而影响消灭法西斯的最终目标;二)有利于战后苏联的安全。苏联政府认为,必须建立苏联信得过的东欧各国政府。这些国家战后应是独立的,但其政府不能对苏联怀有敌意,其外交和军事计划必须经过苏联的认可。战争结束后,东欧各国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激化,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也随之加剧。苏联为了在东欧建立完全信得过的政府,采取了排斥各国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作法。

在斯大林的“安全带”的考虑中,波兰具有它在“防疫带”中同样具有的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即使波兰西移,仍旧是西方进攻苏联的主要通道。因此,斯大林认为“波兰问题与苏联的安全问题不可分割”,<sup>⑥</sup>“是个战略安全问题”和“生死悠关的问题”。<sup>⑦</sup>1945年5月,斯大林向霍普金斯明确表示,波兰的麻烦在于英国保守党希望沿苏联边界重建一条防疫带,因此苏联决不能在波兰问题上做出原则性的让步,苏联必须有一个友好和强大的波兰。在波兰问题上,斯大林的坚定政策与英美的既定方针形成了尖锐对立。我们只要回忆一下丘吉尔与斯大林关于波兰问题的争吵,罗斯福去世前把波兰民主政权称作伪装政权,就足够了。围绕波兰问题的争吵是防疫带和安全带战略无法调和的缩影。

②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9页。

③ 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托因比,《欧洲的重建》上册,上海1981年版,第35页。

④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721页。

⑤ 弗·沃尔科夫主编,《评资产阶级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史的伪造》(Критика буржуазных фальсифицированной истори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Европе),莫斯科1986年版,第70页。

⑥ 苏联外交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通讯》第1卷,莫斯科1985年俄文版,第296页。

⑦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1974年,第140—141页。

安全带和防疫带的矛盾，如果仅仅停留在争吵上，或者经过争吵达成了调和和妥协，那末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矛盾就不会像后来表现的那样尖锐和激烈，也就不会引起东西方冷战的爆发。实际的发展不是这样。在两种战略的斗争中，斯大林成为胜利者。他的安全带战略，除了在南斯拉夫受到铁托的一定抵制外，基本得到了贯彻。斯大林可能认为事情的进展是令人满意的，而希望保持现状，避免与西方发生新的冲突。但对西方来说，安全带战略的胜利就意味着防疫带战略的失败。承认既成事实就等于放弃在东欧对苏联的遏制，让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中欧完全暴露在共产主义的“威胁”面前，让地中海成为西方和东方共有的海洋。这是西方无论如何不愿承认的事实。这就是西方向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宣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里，我们看到防疫带和安全带两种战略的斗争包含一个本质的内容，即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两种战略中哪种战略能够实现，实现后能否巩固，要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种制度在东欧的胜利和巩固为转移。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是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剧烈冲突的根本原因。

首先我们看到，罗斯福和丘吉尔受到欧洲事态客观发展的制约，考虑到法西斯德国给苏联带来的巨大破坏和苏联为消灭法西斯而付出的巨大牺牲，并非绝对地反对斯大林的“安全带”思想。在他们的最终考虑中，如果通过对安全带的一定的让步能换取他们所追求的最根本的东西，那他们并非坚决反对让步。罗斯福参加德黑兰会议前曾说：“我的确感觉到，斯大林所需要的东西，不是别的而就是他自己国家的安全。所以我想，假使我把我所能够给他的东西都完全给他，但是却向他要求任何的报酬，那末他也就不会再想去吞并任何地方了。”<sup>③</sup>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罗斯福在德黑兰向斯大林表白说，他愿意考虑苏联的安全需要，并且“开玩笑”地向斯大林保证，在苏军重新占领波罗的海三国时，“他不打算就这个问题同苏联交战”。<sup>④</sup>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的第一天就声称苏联西部的安全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和罗斯福都赞成苏联重新制定波兰边界的要求。而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表示愿意以默认苏联对西部领土的要求换取苏联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承认。会后，丘吉尔在下院辩护说，考虑到俄国人在解放波兰时所作的牺牲和他们的部队驻在那里的的事实，他认为他们的领土要求已经是非常有节制的了。所以，英美实际上部分地承认了苏联在东欧的安全利益。

英美政府懂得，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问题具有根本的意义，它制约和决定着东欧其他问题的存在和发展。1944年10月，丘吉尔向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指出，波兰流亡政府之所以得不到苏联的承认，是因为它在边界问题上的僵硬态度。他公开表示，他对波兰的主权和独立比对边界问题更为关切，“决不会同意一项不让波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的解决办法”，“不能同意承认波兰的卢布林政府”，<sup>⑤</sup>坚持让资产阶级的流亡政府回国当权。因此，英美与苏联关于东欧问题的最激烈的争论最终集中在让哪个阶级和政党领导政府的问题上。英美可以在安全带的问题上向苏联让步，可以容忍建立芬兰这样的资产阶级掌权的中立国家，但是绝对不能容忍在东欧建立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使这样的制度并非由苏联移植，而是像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等是由人民自己争取到的也罢。因此，英美对希腊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对铁托施加压力，而全力支持东欧各国的资

<sup>③</sup> 切斯特·威尔蒙脱，《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争夺战》，台北军事译粹社1978年第3版，第108页，

<sup>④⑤</sup>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81、140页，

产阶级如米科拉伊奇克、米海依洛维奇、马尼乌和佩特科夫之流。托因此指出，英美与苏联在波兰问题上争执的关键，不在于未来的边界，而在于未来的政府。政府性质上的根本分歧是“战时的大联盟破裂的作用最大的唯一的因素”。他在这里确实看到了问题的关键。

斯大林从相反的立场懂得丘吉尔、罗斯福所看到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让英美军队进入东欧推行他们的政治和制度，东欧人民反法西斯的民族民主革命成果就会丧失，东欧就会出现不只一个希腊，而会再出现8个。如果不支持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容忍西方的干涉和东欧各国资产阶级的任意发展，那末不但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取得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成果也未必保得住。从对苏联本国利益的关系看，斯大林认为安全带只有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的确立为基础才是可靠的。因此，他在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上坚决顶住了西方的压力。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说：“波兰这条走廊不可能只由俄国武装力量从外部加以封住，而只有依靠波兰自己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一点”。<sup>⑤</sup>他说的“波兰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是亲西方的波兰流亡政府，而只能是波兰工人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斯大林表示，友好的波兰只能是工人党领导下的波兰。因此，尽管波兰流亡政府在反法西斯的大目标上与苏联是一致的，斯大林还是武断地斥责这个政府“和希特勒一起诽谤苏联”，与它断交，单方面地承认波兰工人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波兰政府。1945年5月11日，斯大林在致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派克先生的信中提出解决波兰问题的三个条件：“（一）如果在改组波兰临时政府时，承认该政府为未来波兰民族统一政府的基本核心，就像过去在南斯拉夫那样，承认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联合政府的基本核心；（二）如果改组的结果是在波兰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它将实行对苏联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实行反对苏联的“防疫线”政策……”<sup>⑥</sup>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苏联对政权建设中的罗共、保共、匈共、捷共等的支持，虽然支持的方式因各国具体情况而异。

由于围绕战后东欧各国社会制度的对抗是根本性的对抗，因此，东西方可以在有关东欧国家的边界问题、经贸问题、赔款问题、和约问题等上面达成协议，或者解决问题，或者妥协，只有在建立哪个阶级的政府和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上，东西方始终不能调和。一战以后，资本主义大国最关心的是消灭俄国和匈牙利的布尔什维主义。二战以后，西方感到“几乎东欧每一个小国的名称都使人想起我们的目标的幻灭”。<sup>⑦</sup>由此可以说，冷战政策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迫使苏联“撤退他们东欧的势力”，<sup>⑧</sup>把社会主义的“范围缩小”，并且为此“开始在欧洲构筑借以隔绝共产主义世界的墙壁”。<sup>⑨</sup>

综上所述可以说，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剧烈冲突是冷战的主要起因，这场冲突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搏斗。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认识当前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的斗争、斗争的内容和方式，是会有启发的。

〔本文作者康春林，194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⑤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41页。

⑥ 《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26—427页。

⑦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洲》(Crusade in Europe)，纽约1948年版，第60页。

⑧ 乔治·凯南，《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2页。

⑨ 弗·祖耶夫，《美国史学中的“冷战”与缓和问题》，载《评资产阶级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史的伪造》，第84—85页。